

# 《旧唐书》与《新唐书》“突厥传”之比较

姬瑞聪

**内容摘要:**《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时期,而《新唐书》编撰于北宋。因此,新、旧《唐书》“突厥传”在史事记载上有所差异。通过比较可发现差异主要体现在事增、文省、写作笔法等三个方面,而成书背景、学术风气、文风和史料来源等是造成新、旧《唐书》“突厥传”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旧唐书》《新唐书》突厥传

自《新唐书》成书以来,关于新、旧《唐书》孰优孰劣的比较成为史学家争论的焦点。欧阳修在《进新唐书表》中云:“其书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sup>[1]</sup>认为文省事增是《新唐书》胜过《旧唐书》的原因之一。而宋代吴缜在《新唐书纠谬》中认为“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较其彼此同异。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sup>[2]</sup>这些均体现在新、旧《唐书》“突厥传”。

## 一、新、旧《唐书》“突厥传”之异

由于成书年代、史料来源等不同,新、旧《唐书》在记载“突厥传”的史事记载上有所差异。黄永年先生认为新书列传最大的问题就是“文省”和将旧书文字改成涩体。通过对比发现,新、旧《唐书》“突厥传”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新唐书》的“文省事增”和两书写作笔法的差异上。

### 1.《新唐书·突厥传》“事增”部分

《新唐书》是针对《旧唐书》存在的不足而重修的,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是书本以补正刘向之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

旧’。”<sup>[3]</sup>简之,“文省事增”是新书的一大特点。《新唐书·突厥传》“事增”部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唐书》详细说明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其次,《新唐书》补充了《旧唐书》简略叙述的史实。最后,《新唐书》补充了《旧唐书》未记载的历史史实。可从两《唐书》“突厥传”有关对乙毗咄陆可汗国大乱原因的记载看出。《旧唐书》记载为:

咄陆初以泥孰啜自擅取所部物,斩以徇;寻为泥孰啜部将胡禄居所袭,众多亡逸,其国大乱。<sup>[4]</sup>《旧唐书·突厥传》只提到泥孰啜擅自拿咄陆部东西,但没有谈到具体的前因后果,但是在《新唐书·突厥传》中有详细记载。《新唐书》云:

(咄陆)遂与共攻康居,道米回国,即袭破之,系掳其人,取货口不以与下,其将泥孰啜怒,夺取之,咄陆斩以徇。泥孰啜之将胡禄屋举兵袭咄陆可汗,多杀士,国大乱,将归保吐火罗,大臣劝其返国,不从,率众去,度叶水,及石国,左右去略尽,乃保可贺敦城。<sup>[5]</sup>

《新唐书·突厥传》说明了由于咄陆不与泥孰啜分享战利品,所以泥孰啜便擅自拿了咄陆部物品。另外,《新唐书》还记载了咄陆

被泥孰啜的部将胡禄居袭击,咄陆国大乱,后来他的大臣劝他归国,咄陆未听从,于是率众,逃往石国。这在《旧唐书》中并未记载。

总之,通过对比可发现,“事增于前”可以说是《新唐书·突厥传》最有价值的地方。虽然黄永年先生认为:“《新唐书》一味的追求古雅,把旧书原来文字从字顺的文字改成涩体,甚至把原来用骈体文写的诏令、奏议也改成涩体,还喜欢用许多早已死去的古字来更替常用字。”<sup>[6]</sup>并且认为:“《新唐书》列传最大的问题是‘文省’,硬把就输列传的文字压缩,往往压掉了有用的史料。”<sup>[6]</sup>但《新唐书·突厥传》不仅补充《旧唐书》未记载的史料,而且在史事记载上更加详细。

### 2.《新唐书·突厥传》“文省”部分

虽然《新唐书》史料增多,但“文省”也是《新唐书》一大特点,同时体现在“突厥传”之中。《新唐书》的撰修者欧阳修治史重视文辞的简要,如他在评论《春秋》时说:“述其文曰则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又法而不简也。”<sup>[7]</sup>所以在修《新唐书》时也追求文辞的简要,把“文

省”作为其修史的一大特点。

新、旧《唐书》突厥传“文省”部分主要体现在《新唐书·突厥传》删减骈体诏疏。清代赵翼在对新、旧《唐书》进行比较后认为：“欧、宋二公不喜骈文，故凡遇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其他如章疏之类，有关政体治道者，或就四六改为散文，或节其要语存治，固未尝概为删汰”。<sup>[9]</sup>由此可知，唐代诏令、奏议等大都用骈体文写成，对此欧阳修、宋祁大多是全文删除旧书中的骈体诏疏。如在两《唐书》“突厥传”均了记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玄宗东巡期间带领颉利发及诸蕃酋长入仗射猎，玄宗一箭射中猎物，颉利发夸赞玄宗，因此玄宗经常下令让突厥人人仗射箭打猎的史实。但《旧唐书》还记载了起居舍人吕向对于玄宗经常下令让突厥人人仗射箭打猎的上疏。《旧唐书》详细记载了：

起居舍人吕向上疏曰：“臣闻鸱枭不鸣，未为瑞鸟，猛虎虽伏，岂齐仁兽，是由丑性毒行，久务常积故也……待不失常，归于得所，以谓回两曜之鉴，祛九宇之忧，孰不幸甚！”上纳其言，遂令诸蕃先发。东封回，上为颉利发设宴，厚赐而遣之，竟不许其和亲。<sup>[10]</sup>

这段话在《旧唐书·突厥传》中以骈体写成，详细记述了吕向上疏的内容，而《新唐书·突厥传》则未记载起居舍人吕向的上疏。总的来说，虽然《新唐书·突厥传》删减骈体诏疏，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失去史料价值，因为它还是完整的记载原有的史实，而且遇到特别重要的记载，要么将其改为散文，要么截取重要的政治言论。

### 3. 写作笔法的差异

古文运动在北宋时期再次兴起，北宋史家推崇《春秋》，故难免以“春秋笔法”写史。“春秋笔法”是指史家通过细节描写，委婉的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进行评判。《新唐书》编撰者运用“春秋笔法”撰写史书的原因是为了辨明心迹，让为恶者臭名昭著，并让为君者、为臣者能够畏惧。最具代表性的是，史书中对三个表示杀的动词的运用。其实杀、弑、诛三词各有深层含义。杀指无罪而杀，弑指以下犯上，诛则指有罪、有理而杀。在新、旧《唐书》“突厥传”中“杀”字均有运用，如“杀人皆于都市”对“且闻汉法杀人必都市”。但“诛”字只有《新唐书·突厥传》有记载，如“赦不诛”，而《旧唐书·突厥传》仅记载为“诏特免死”，并未出现“诛”字。

因此，春秋笔法讲求运用不太显眼的字眼等隐讳的写法，暗暗加入自己的主观看法对历史人物加以评价。然而史家讲求秉笔直书，一旦史家添加自己的主观看法，便扭曲后世对史事的认知。

### 二、新、旧《唐书》“突厥传”差异之因

《新唐书》的撰修是由宰相贾昌朝于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提出的，此时儒家思想重新得以确立，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宋仁宗朝的政治、经济改革由兴起到失败。因此，历史背景的不同是造成新、旧《唐书》“突厥传”差异的主要原因。

#### 1. 成书背景之异

宋太祖建国初年，为了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消除了将领拥兵自重的隐

患。但这在巩固皇权的同时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造成北宋之后与辽、西夏作战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自从雍熙北伐之后，辽朝经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到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发生侵宋战争。”<sup>[11]</sup>大庆二年（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此后宋、夏之间发生了数年战争，而宋屡战屡败。因此，这此背景下撰写《新唐书》的史家在编纂突厥正史之前，增添了一段刘昫、杜佑及杜佑孙子杜牧等人对边患的看法及其建议。而北宋史学家在此撰写历代王朝的边患政策，应该是希望当政者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

#### 2. 新旧《唐书》史料来源的不同

五代时期战争不断，许多史籍散佚难寻。因而《旧唐书》在修撰的过程中，遇到了史料严重不足的问题。五代史家以史馆为依托，通过政府搜集、购买、抄录大量唐代史料。宋王溥《五代会要》记载：“赵莹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求购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裕元年的史料：‘撰述得传一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网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sup>[12]</sup>因此，《旧唐书》关于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裕元年的史料来源于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此外，《旧唐书》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是吴兢的《唐书》，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手续增，规模未改。昫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sup>[13]</sup>

对于边疆民族列传的史料来源，黄永年先生在《唐史史料学》中说：“给兄弟民族以及外国所立

的突厥、回纥、吐蕃等所谓四裔传,则不同于一般列传、类传。《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中所说“藩国朝贡,蕃夷入寇及来降”,以及实录中的有关记载,应是四裔传史料的主要来源。”<sup>[6]</sup>因此,《旧唐书》“突厥传”的史料主要来源于蕃夷朝贡、入寇来降的记录以及实录相关记载。最后,《新唐书》虽对《旧唐书》有所增删,但它仍是在《旧唐书》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另外,孙甫的《唐史记》,王彦威《唐典》以及宋敏求所补唐武宗以下六代实录,都为修撰《新唐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 3. 学术风气之异

后晋刘昫所修的《旧唐书》,遵循唐代国史遗风,较完整地保留着唐代史学的风貌。而《新唐书》成书于北宋庆历年间,正是儒家思想重新得以确立、古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政治、经济改革由兴起到失败之际。北宋建立后,虽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稳定,但此时一些上层士大夫歌功颂德、沉迷享乐,使得晚唐五代以来的绮靡浮艳文风进一步发展。同时,地主、大官僚兼并日益加剧,北有辽国为隐患。而仁宗君臣为了像唐朝国运长久,效仿唐朝的典制,掀起一股复古的风气。在史学方面,宋代史学家抨击纪传体史书“叙事依违,失褒贬体”,推崇以《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论史的写史方法。因此,生于该时期的宋祁在撰写《新唐书》时不可避免的运用“春秋笔法”。

总之,北宋时期的统治者不仅重视唐代的治乱兴衰,又欲以《春秋》褒贬之法认识唐代的历史。而撰修于后晋的《旧唐书》显然不能满足北宋统治者的政治需

要。

### 4. 文风之异

《旧唐书》的编撰者写史好用骈文。因此,在《旧唐书·突厥传》中可以看到大量骈体诏疏。另外,《旧唐书》的作者推崇时文,大力颂扬元稹、白居易,因此对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的评价并不高。

这与《新唐书》编撰者的文风恰恰相反。欧阳修与宋祁不仅是《新唐书》的主要纂修官,而且还是北宋时期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批判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提出道先于文,为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写了大量平易自然的散文,使散文反映现实生活。据宋祁在《宋景文笔记》中记载:“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大抵史近古,对偶直令,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鞞鼓,非所施云。”<sup>[12]</sup>由此可知,宋祁主张以散文写史,反对史文的骈俪化。因此,《新唐书·突厥传》删减了《旧唐书·突厥传》中的大量的骈体诏疏。

### 三. 结语

北宋史学家认为后晋所修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且由于撰修者身处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诫、示久远。”<sup>[14]</sup>因此,宋仁宗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下诏由重修《唐书》,以弥补《旧唐书》的缺憾。《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新唐书》时认为“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

舛漏,自称事增于前,文省于旧。”<sup>[11]</sup>因此,“事增文省”是《新唐书·突厥传》相对于旧书而言最大的差异。此外,《新唐书》撰修者一味地追求古雅,推崇春秋笔法。因而,在《新唐书》突厥传中拗口、难以理解之处,仍需要以《旧唐书》突厥传作为补充。

### 注 释

[1]《新唐书》[M].附录“进唐书表”,中华书局,1975年,第6471页。

[2][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序》[M].《四库全书》本,第276册,第620页。

[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卷四十六《史部·正史类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633页。

[4]《旧唐书·突厥传》[M].卷一百九十四,列传一百四十四,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5页。第5176页。

[5]《新唐书·突厥传》[M].卷二百一十五下,列传一百四十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059页。

[6]黄永年.《唐史史科学》[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3页。第11页

[7]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M].卷7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102册,第574页。

[8]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卷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第340页。

[9]王明荪.《中国通史 宋辽金元史》[M].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10][宋]王溥.《五代会要》[M].卷18《前代史》,中华书局,1998年,第228页

[1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卷46《史部·正史类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632页。第633页。

[12][宋]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上》[M].《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三·杂说之属》,商务印书馆,1933年。

(作者介绍:姬瑞聪,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